



中国对非援助编年研究 (1956-2015)

On the Chronicle of China Aid to Africa (1956-2015)

胡美 著



中国对非援助编年研究 (1956-2015)

On the Chronicle of China Aid to Africa (1956-2015)

胡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对非援助编年研究(1956—2015) / 胡美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 -7 -5117 -3341 -2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外关系 - 对外援助 - 研究 - 非洲 - 1956 - 2015

IV. ①D8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9167 号

中国对非援助编年研究(1956—2015)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46(馆配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74 千字

印 张: 42.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55626985

序

中国对非援助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促进中非关系的发展，推动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随着近十几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中国援非问题，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

西方学者大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援非，从而给中国援非涂上了负面的色彩。这种状况近来有所改变。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比较客观评价中国援非，比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对于中国援非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方对于中国援非的研究和评价还程度不同地带有冷战思维。非洲学者对于中国援非见智见仁，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对于中国援非也有一些误解。面对国际社会的研究现状，中国学界有责任对中国援非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援非给予客观、正确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以正视听，让世人真正了解中国援非的实质和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援非的研究逐步升温，然而，纵观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关注点较多聚焦于近年来中国援非对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作用、批驳西方学者散布的“资源掠夺论”和“新殖民主义论”等，对于中国援非的历史、中国援非政策的变化、中国援非的本质等问题的研究还是偏少。最近，十分欣喜地阅读了胡美博士撰写的《中国对非援助编年研究（1956—2015）》，读后感触良多。深感这是国内学界在中国援非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本著作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研究覆盖了中国援非历史的全过程。

作者对于中国援非的研究时段，设于 1956—2015 年。众所周知，

1956 年是中非建交元年,而 2015 年则是本书截稿的前一年,总共 60 年。换言之,作者把研究的时段拓宽到最大极限。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对于中国援非历史最长时段的研究。在以前的研究中,有学者截取某一时段,如对于“文革”之前中国援非政策的研究^①,更多的是对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援非的研究。相比之下,胡美的研究时段涵盖了中国援非的几乎全过程,因此可以全面呈现中国援非的历史进程,梳理中国援非政策的变化和走向,从而更加清楚中国援非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价值。

第二,研究细分了中国援非历史的各时段。

由于作者的研究视角涵盖了至今为止的中国援非历史的全过程,因此就获得了对于中国援非历史的不同阶段进行细化的可能性。与以往学术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阶段或者四个阶段不同^②,作者把中国援非历史划分成九个阶段,并且每一时段作为一章阐述。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各种划分方法的合理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把中国援非历史进行更小时段的划分和研究,更加容易勾画出中国援非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细小变化。比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援非往往予以忽略或者一笔带过,从而使这个时期的中国援非历史显得模糊。本书把 1971—1976 年专门划为一个时段,并且以“文革中起伏的对非援助”为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使“文革”时期中国援非的历史变得清晰。毫无疑问,与以前的同类研究相比,作者对中国援非历史的时段细分,在一定意义上进入更加微观的层次,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援非历史的研究逐步向微观研究的方向发展。

第三,对中国援非政策做了更加深入的剖析。

作者对于中国援非政策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其一,从内因看,中国援非政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团结互助、平等观和义利观等)的

① 张浚:《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1956—1965》,见《外交评论》2010 年第 5 期;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政策形成的再考察》,见《外交评论》2016 年第 5 期。

② 张宏明把中国援非分为两个阶段;李小云、武晋把中国援非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张海冰划分为四个阶段。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沿革及其在中非关系中的作用》,《亚非纵横》2006 年第 9 期;李小云、武晋:《中国援非的经验与面临的挑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张海冰:《中国对非发展援助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上海商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

熏陶与辐射，这一观点不但揭示了中国对非援助赖以存在的深厚和内在的历史基础，而且预示了这一政策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从外因看，中国援非政策与时俱进，能够满足非洲发展的需要而进行适时调整和完善。十分明显，内因与外因的相互渗透，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使中国援非政策超越了当下南北经济关系的模式，成为一种崭新的国际经济关系。

第四，创新编年史撰写方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采用编年史的形式。众所周知，编年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编撰方式，其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作者为了避免编年史的不足，采用细分时间段和增加理论阐述的方法，即根据中国援非进程中不同形势和特点，把中国援非的60年细分为9个阶段，并且在各个阶段都专门增加了理论阐述的内容，剖析各个阶段面临的形势和具有的特点。此外在全书专设“绪论”，论述中国对非援助的精神实质与本书的核心思想，便于读者对中国对非援助有一个宏观的总体把握。作者在编写方法上的创新，对于避免传统编年史写作体例的缺陷，产生了一定作用。

胡美博士对于中国援非的研究已有数年，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本书既是对以前研究的总结，也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的提高。希望她能坚持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且继续看到新的研究成果。

总之，胡美博士的研究成果不失为一部有质量的著作，我愿意向学界推荐。

舒运国

于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2017年1月9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国对非援助 60 年：从历史步入现实	1
二、60 年中国对非援助的若干特性	4
三、中国对非援助研究及其资料撷取	11
四、中国对非援助编年：基于中国对非援助的资料整理	17
第一章 在革命中起步的中国对非援助（1956—1962）	25
第一节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对非援助的起步	25
一、中非间的早期交往	25
二、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的特点	26
第二节 编 年	31
第二章 中国对非援助的初步成形（1963—1970）	55
第一节 中国对外援助原则的初定与中国对非援助的勃兴	55
一、中国对非援助的格局与品位	55
二、中国对非援助的新发展	58
第二节 编 年	60
第三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伏的中国对非援助（1971—1976） ...	95
第一节 “文革”激情的激荡与中国对非援助的高峰	95
一、接替“台湾农耕队”的工作	95
二、全国援外工作会议与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调整	97
三、抓援外、促国内	98

第二节 编 年	100
第四章 在痛苦中反思的中国对外援助 (1977—1982)	155
第一节 中国对外援助的反思与痛定思痛	155
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反思	155
二、对外援助对外交关系的推动	156
三、援助项目情况	157
第二节 编 年	159
第五章 在改革中探索的中国对外援助 (1983—1990)	209
第一节 与改革开放协奏的中国对外援助改革	209
一、援非新方式的探索	209
二、中国总理再踏非洲路与“四项原则”	210
三、新援外方式的萌芽及发展	211
第二节 编 年	213
第六章 在合作中不断开创的中国对外援助新局面 (1991—1999)	268
第一节 合作的发现与中非合作新时代的创造性拓进	268
一、非洲：新的合作伙伴	268
二、市场化因素与中国援非模式新探索	269
三、新的援非模式在非洲的推广	271
第二节 编 年	273
第七章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时代的开启 (2000—2005)	315
第一节 在合作中大踏步前进的中国援非	315
一、中非合作论坛的启航	315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的探索步履	317
第二节 编 年	321
第八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合作的全面提升 (2006—2012)	383
第一节 北京峰会后中非合作的深入推进	383
一、第三、四、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的推进	383
二、峰会以来中非合作的全面提升	385

第二节 编 年	388
第九章 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2013—2015）	563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对非援助前进的新步伐	563
一、习近平访问非洲与中非合作新蓝图的铺开	563
二、新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新进展	565
三、埃博拉疫情时期中国对非援助	568
第二节 编 年	569
参考文献	656
后 记	666

绪 论

一、中国对非援助 60 年：从历史步入现实

援助在非洲的政治和社会中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非洲学者并不讳言：“我们生活在援助的文化里。”^① 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日益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至今，除斯威士兰外，中国向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提供过援助。作为非洲传统的“新兴援助者”，中国已经向非洲连续提供了 60 年的援助，在非洲的国际援助中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2013 年公布的援助数据库（AidData）显示，2000—2011 年间，中国共向 50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1673 个项目。^② 另一组数据则估计，2013—2015 年间，中国的对外援助额度将达 200 亿美元，大约为三年前的两倍。^③ 2013 年，中国对外援助的预算总额为 63 亿美元，占 GDP 的 0.07%。^④ 2010—2012 年，中国共向 121 个国家提供了 144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非洲的受援对象共有 51 个。^⑤ 根据 2011 年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的数据，对非援助大约占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国际对外援助中日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 年，中国的援助额度大致与法国的援

① [赞比亚] 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第 21 页。

② <http://aiddata.org/>

③ “China aid to Africa needs Transparency”, *Global Times*, Jan 29, 2013.

④ Cheng Zhiming and Russell Smyth, “Why Give it Away When You Need it Yourself? Understanding Public Support for Foreign Aid in China,” MPRA Paper No. 59052, October 2014, <http://mpra.ub.uni-muenchen.de/59052/>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1 页。

助额度相当。^①

这一连串重要信息都在提示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的迅速扩展，铺天盖地的数字似乎给人这样的错觉，中国作为一个援助者是近几年才空降到非洲，然而，早在创造这些数字之前半个世纪，中国就已开启了对非援助和中非合作的征程，中国不仅是非洲的新伙伴，而且是老朋友。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通过援助参与了众多非洲国家的民族自立之路。在早期，囿于国力的局限，中国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规模不如其他国家大，这种援助与支持不是决定性的，然而，它却让非洲国家在寻求民族自立的过程中不感到孤独，始终有支持的声音相伴。对在水深火热中浴血奋战的非洲国家来说，这种精神鼓舞绝非无足轻重，埃及抗侵略时期的驻华大使加拉卜在谈到中国的援助时毫不讳言中国的重要性，称来自中国的援助“在提高埃及人民反对罪恶的侵略者的时期和巩固中埃两国友好关系上起了巨大作用”^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非洲都进入了渴慕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外援，“他们需要外国的财政支持只是为了维持运转”。^③ 作为一个来自南方世界的发展合作伙伴，中国的援助出发点与西方的理念有着较大的差异，它并不奉援助资金为圭臬，而是坚持通过合作保持发展的节奏，走出了迥异于传统外援的步履。伴随着这一节奏，中国对非援助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拓展，逐渐地向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相关的举措转变，合作成为这些举措中最富想象空间和拓展能力的新手段。中国在援助与合作中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充分地利用非洲国家在发展上所具有的本土资源，通过合作的方式让这些优势因素进入发展领域，同时重点关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中国的合作和援助的模式深受非洲国家欢迎，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南方国家，中国低起点的发展恰恰为有着同样起点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更为现实而鲜活的发展样本和经验。为此，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如是说：“比较起其他国家来，我们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学到更多。中国以积

① N. Kitano & Y. Harada, “Estimating China’s Foreign Aid 2001 – 2013”, JICA-RI Working Paper No. 78, 2014.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③ [英] 乔纳森·格伦尼：《良药还是砒霜？援助并非多多益善——非洲援助之惑》，周玉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

贫积弱和欠发达为起点，超越世界上众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非洲与中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如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贫弱的发展基础等等……这让非洲人相信，依循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们也有希望走向成功。”^①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非洲不再是一个等待援助的受援对象，而是一个发展道路上的同行者和发展伙伴。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而是中国和发展道路上的无数合作伙伴携手前行的共同结果，非洲就是这类伙伴中的重要成员。基于此，中非援助关系走出了传统援助关系中“输灌”和“恩赐”的模式。从心理定位上，中非从援助者的优越感和受援者的卑微感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平等的发展伙伴。

这种合作因奉行优势互补和你帮我助让合作双方的劣势得以弥补，而优势充分激发释放。非洲本土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为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需要燃料，而非洲刚好有燃料。但对非洲来说，它是为了生存。在近期，非洲正得到它所需要的——确实有助于发展的高效资本和为非洲的就业提供无法估算的增长”^②。在援助所关注的领域和提供的方式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正如卢旺达前总统卡加梅所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带来了私营部门的发展，而西方国家的投资绝大部分只是为了攫取非洲的资源”，“中国给予非洲所需要的：政府和公司所需要的投资和资金，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修路筑桥”。^③ 不同的介入方式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进程。到2000年，当合作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之时，中非之间建立一个平台性的合作机制渐趋成熟，通过其他类似平台获益的非洲国家极力推动这一机制的建立，因此，在世纪之交中非共同建设了这一属于新时代的新的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在中非援助与合作关系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经过六届会议经验的累积，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许多必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④ 中非合作论坛日益成为中非合作和中非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舞台，也成为中非未来谋求

① *New York Times*, 5 Nov., 2006.

② [赞比亚] 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③ *Reuters*, 12 Oct, 2009.

④ Ian Taylor,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Routledge, 2010, p. 101.

共同发展、创造发展机遇的高端平台。通过一系列的富于发展创意和高效的合作互动之举，中国在非洲发展中的积极角色不仅得到非洲国家的赞同，也日益得到了世界的认可。非洲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称：“北京是非洲所享有的福利。”^① 经济学家甚至认为非洲正在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并鼓励非洲国家应抓住此轮“中国机遇”。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兴大国的异军突起正在重新塑造和整合国际经济地图，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冲击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也改写着非洲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国际形势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让置身其中的非洲明显感觉到这种异动。与外部世界所预料的不同，这种新兴的、指向中非共同发展的合作因其良好的效果而广受非洲国家的欢迎。此后，中国在非洲新兴的援助与合作手段引起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效仿，这种合作发展的模式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复制和繁殖，成为南方世界谋求内部发展的一个特殊杠杆和一种合作新模态。这些效仿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加入到这场对非合作发展的南方发展运动当中来，带领非洲走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姆苏利·恩库比表示：“作为新兴的合作伙伴，随着南方国家在对非合作中扮演日益重要和关键的角色，非洲发展的前景正在迅速发生变化。”^② 就是这样的互助和合作，让曾一度对非洲悲观失望到极致的西方世界也认为非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2000年，西方《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上赫然评价非洲为“了无希望的大陆”。^③ 到了2011年，同样是《经济学人》杂志，却改口称“正在崛起中的非洲充满着发展的动力和希望”^④。作为一片充满希望和前景的大陆，非洲重新回到西方世界对外合作发展的视野当中。

二、60年中国对非援助的若干特性

中国对非援助所走过的60年是一部中非交往的壮丽诗篇，这段历史

① Dambisa Moyo, “Beijing, a Boon for Afric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12.

② Richard Schiere, Leonce Ndikumana and Peter Walkenhorst ed., *China and Africa: An Emerging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2011, p. iii.

③ “Hopeless Africa”, *The Economist*, May 11th, 2000.

④ “The Hopeful Continent: Africa Rising”, *The Economist*, Dec 3rd, 2011.

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在长期的援助实践中锤炼出一套深刻的观念体系。随着中国援非的深入，这些理念在援助的诸多重要领域和项目中都有展示，它突破和超越了传统援理论中的若干要素，包含着诸多为中非共同敬守和尊崇的原则和理念。这些深入中国援非实践60年之久的精神要素，伴随着中非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浮而经受了历史的淘洗，伴随着中国的援助政策的变迁而得以承继和延传，成为中国援非中的经典原则和理念。这些原则和理念装点和修饰了半个世纪的中非关系，让中非友谊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依然质不变、色不褪。这种理念不再是在调和传统理念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南方国家的特性建构起来的南南交往的行为规范和互动规则。具体说来，这种交往理念和互动规范是在遵循以下规则和特征的前提下建构起来的。

第一，中国对非援助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行为规范和外交准则。

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软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推进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非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辐射。近十几年来，西方人在不断地探索中国援非获得非洲人认可的原因所在，但往往效果不佳，长期隐匿在中国援非政策中的文化因素也成为西方无法效仿中国援非政策和效果的密钥所在。概言之，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团结互助夯实中国援非的基础。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南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同处弱者地位，中国选择了处于殖民主义水深火热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尚低的非洲作为援助对象，这主要是基于中国认为，无论援助伙伴的力量强弱与地位高低，人多就能构成大力量，也因此成为中国试图通过援助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最朴素最简单的初衷。无论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对于非洲而言，发展都是一个艰巨的历史命题，不是靠单个的力量所能完成，因此，联合、互助是弱小民族遇到强大对手和难以完成的历史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智慧，通过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的力量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论是团结还是互助都是中非双方共同恪守的文化原则，因而也成就了中国援非中双方对这一原则的恪守与坚持。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非洲的谚语：“河有源

泉水才深。”^① 这表明，中非两大民族都是强调不断为双方的关系增添力量源泉的民族。李克强总理在非盟发表演讲时，用“蜘蛛合力，足以网住狮子”这句埃塞俄比亚谚语，表明团结不仅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原则，也是非洲文明中的重要思想。这种文化信念上的相似增加了中非合作中的相互认同。从中国援助非洲的第一笔资金来看，中国人民并不是因为力量的强大、国家的强盛而选择援助非洲，相反，它坚信，中非都是受压迫受奴役的民族，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就可以取得斗争的胜利。从援助的数额来看，中国的援助并不是特别多，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中国力量的加入让非洲人民感受到了来自遥远东方的坚定支持，这种精神上的鼓舞胜于物质上的支持。因而，在提供第一笔援助之时，中国凭借的不是援助数量的多少，也不是国力的强盛，而是相信中国的援手可以增加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在中非的互动交往中，中国也有机会依托非洲的肩膀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虽然说，在援助中，依托非洲的优势来发展自己并非其初衷，但客观上却让中国具有了借助非洲优势发展条件的可能。

其二，义利观练就了中国援非的利益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追求和崇尚财富的，但这种追求是有限度的，其标准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道”，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强调援助的无偿性，不求任何回报。然而，主观上的不求回报并非客观上没有任何回报。在坚持无偿援助非洲国家十多年后的1971年，在非洲等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不求回报却意外获得了非洲国家更加坚定而恒久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用援助所花费的金钱所能交换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援非的利益原则由强调援助不求任何回报调整为中非双方的互利双赢，中国的利益诉求调整到与非洲利益平等的层面上来。互利双赢不仅意味着强调非洲在其中的所得，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强调自身的利益。中国文化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就是主张获得财富，但要求注意获得这些财富的方式与途径，必须符合中国人所讲的“道”。在援非中，中国并不主张所有的援助都无偿给予，而是主张“互利共赢”，在中国所提供的援助所能带来的“利”和“赢”面前，中国所讲求的“道”在于“互”和“共”，

^①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全文），2013年3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501703_2.htm

即让双方都拥有利益和共同分享所赢之利。

其三，文化敬重培育着中国援非的平等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一一种敬畏谦卑的文化情怀。孟子有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事物之间的差异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应该尊重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平等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贯彻到中国的外交方针当中来。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曾表示，小国不是可以随意欺侮的对象，国家的大小只是形式问题，“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①。平等成为中国外交最基本的原则。具体到实践之中，中非坚持在援助中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定位，中国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和强调过。胡锦涛2007年2月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中强调：“过去、现在、将来，中国人民都是非洲人民平等互信、真诚相待的好朋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好兄弟。”^②对于中非之间平等关系的定位，不仅展示在“好朋友”、“好伙伴”和“好兄弟”等辈分的平等上，而且还体现在修饰的定语上，无论是“平等互信”，还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还是“患难与共”，展示的都是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利互惠。

平等和敬重不光挂在口头，而且践行在援非实践中，渗透到中国对非援助的日常工作和交流当中，这种原则只有受援对象可以在受援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中国在1961年底向马里派出第一批农业专家，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就展示了与法国专家截然不同的风范。为专家做饭的是一位曾服务于法国专家的老厨师。他看到法国专家住在别墅，从来不下地，尊称他们为“老板”；看到中国专家住宿条件较差，房间内没有空调，每天跟农民一样汗流浹背地在地里劳动，收工回来两腿沾满泥水，从不认为他们是“老板”。由于中国专家与他们此前见到的西方专家不一样，因而也引起了当地人对中国专家的误解，加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一开始，当地人以为中国专家这样甘愿吃苦是因为在国内没有工作，到马里来找饭吃的。了解真相后，马里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专

① 《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1958年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② 《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重要演讲》，2007年2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2/07/content_5711406.htm

家是与西方专家完全不一样的新型专家。^①

第二，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以非洲国家的发展期待为出发点，围绕着非洲发展而不断调适和革新援助举措的发展之举。

援助者的发展召唤是援助的起点和缘起。援助者的发展召唤不是伴随着援助而天然产生的，援助者的召唤与其自身的发展经历和发展模式有着特殊的联系。与非洲国家一样，中国具有相同的反帝反殖民历史，取得独立后双方有着共同的发展追求，相同的南方国家的身份给了中国和非洲相似的发展环境，它们更能够理解和克服双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障碍，能够更多地实现发展视域上的融合和沟通。非洲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努博（Mthuli Ncube）在突尼斯表示，中国援助非洲的模式“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新模式”，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领域采取的新的援助模式，正向传统的援助模式发出挑战。在他看来，目前联合国千年计划等发展非洲的方案都有机会通过仿效中国援助非洲的模式而得以实现，他特别强调，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不能纯粹通过援助实现，而必须通过内生增长。^② 中国的援助强调非洲国家建立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探索适合非洲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的对非援助中，一直尊奉和敬守援助者和受援者平等互动的原则，因而，受援对象的发展需求有机会参与到援助决策当中来。在中国方面看来，一些具有明确的发展战略的非洲国家，有能力认定自己的发展需求，进而通盘考虑各个援助国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的位置，从而引导各个援助国在本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③ 这种援助关系打破了传统援助中援受的主客二元对立，着重考察援助者和受援者在援助关系中的平等关系，既引领援助聚焦于援助者，而且还聚焦于受援者。这种特性让非洲在援助中拥有发言权和自主性，不令其丧失发展的立场和方向。非洲的发展需求往往要超出援助所召唤的范围和力度，援助者的发展召唤与非洲的发展需求并不一定重合，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唤起”非洲国家的发展潜能提供了契机。这种潜能的迸发和释放不仅能激发非洲国家高效地利用援助，而且能够激发起潜藏在社会深层的发展潜

① 江翔：《中国在非洲十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② Deborha Brautigam, *Assessing China's Growing Role, Realism, Information and Engagement*, 1 November, 2011,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111021389.html>? page=4

③ 周弘：《中国援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6页。